

《再見列寧！》(Good bye, Lenin!)

【影片介紹】

《再見列寧！》於 2003 年 2 月上映，片長 121 分鐘。上映當時，距離柏林圍牆倒塌的冬天尚不滿十四年，政府中樞德國國會也剛搬遷至柏林四年，而新的總理府落成兩年左右。

故事中，克里斯堤安娜·凱納（Christiane Kerner）因丈夫逃往西柏林，導致她長達八周的抑鬱失語。治療返家後，克里斯堤安娜卻搖身一變為忠貞愛國的共產黨員。1989 年 10 月 7 日國慶活動後，她在返家路上目睹兒子亞利（Alex Kerner）參與抗爭遊行，遭警察暴力鎮壓並強行逮捕，引發心肌梗塞，陷入長達八個月的昏迷。

當她甦醒後，醫生告訴亞利，母親不能再受到任何大的刺激，否則會有生命危險。然而在昏迷期間，病床以外的世界已發生驚天動地的大轉變——圍牆倒塌，東德（德意志民主共和國）解體，兩德統一。為了「保護」母親，亞利和家人、鄰居、母親的朋友及自己的同事一起，羅織出東德仍然存在的幻象。卻也在編造「謊言」的過程中，亞利重新認識了自己曾經生活的東德，並充滿矛盾與張力地審視自身在統一後的處境。

在「新德國」的一切都仍未塵埃落定的氛圍下，《再見列寧！》不僅票房成功，也在社會上激起廣泛的討論。德國聯邦政治教育中心甚至為這部電影製作了專門的導覽手冊¹，包含劇情與角色介紹、影像語言分析、前東德政治與社

¹ 德國聯邦政治教育中心，《Good bye, Lenin!》Filmheft，2003。檢索網址：
<https://www.bpb.de/shop/materialien/filmhefte/34162/good-bye-lenin/>

會狀況乃至日常物質生活的解析。手冊也提出了關於劇情的問題和反思，把看電影當作一個學習的機會。

【背景介紹】表面的「東德情結」與壟罩的威權闇影

《再見列寧！》上映後，「東德情結」(Ostalgie) 這個概念引起激辯。「東德情結」是由「東」(Ost) 和「懷舊」(Nostalgie) 組合成的新詞，專指前東德人民對於過往政權與社會的集體懷舊情感。不過在《再見列寧！》上映前，「東德情節」其實已是廣泛的社會現象，人們使用前東德時期的物品、穿搭風格、音樂和政治標語，甚至懷念舊的制度。

例如 1999 年上映的《陽光大道》(Sonnenallee) 即是「東德情節」影視作品中的代表作。該片描述居住於東柏林陽光大道上的一群青年，過著荒誕、對抗體制卻又逸趣橫生的生活。電影上映後招致許多批評，並使輿論擔心「東德情節」造成的負面影響：混淆了個體經驗與制度壓迫，導引了集體記憶的型塑，並淡化威權體制在該時空背景下的影響。這既反挫了歷史反思處置的進程，對於改善急迫的政治、社會問題亦無助益。

《再見列寧！》的導演兼編劇沃夫岡・貝克 (Wolfgang Becker) 與另一位編劇貝恩德・利希滕貝格 (Bernd Lichtenberg)，採用了和《陽光大道》相同的「歷史虛構」(Historical Fiction) 手法，不同的是《再見列寧！》並未淡化威權體制的影響，而是將它作為無可迴避的、推動劇情及角色的線索，讓更多的觀眾透過一個虛構但具普遍性的家庭故事，瞭解劇中時代背景，進而理解劇中角色的處境。

當年主角亞利的父親出逃後，「史塔西」（Stasi，是 Staatssicherheit 的縮寫，用以代稱東德國家安全部及轄下的秘密警察）堂然入室搜查審訊，才使克里斯堤安娜陷入抑鬱且失語，並為她後來的昏迷埋下遠因。亞利父親的「脫東」，僅是當時數百萬人中的一個例子。自成立至解體，東德共流失了近六分之一的人口，即使 1961 年建造柏林圍牆後，也無法阻擋人民「非法」跨越邊界、繞道第三國或藉著有許可的出訪機會逾期不歸²。人們逃亡的原因很多，包括政治迫害、物資短缺以及西德的經濟吸引力等。從克里斯堤安娜的口中可知，亞利的父親因為沒有入黨，處處遭遇限制與刁難，最終只得鋌而走險出逃，卻無法將家人也接至西德，導致家庭分裂的悲劇。母親則因為恐懼，從此絕口不提父親的事。

亞利遭暴力逮捕、母親昏厥的現場，則是東德政權瓦解的前奏。1989 年，不滿和要求改革的情緒達到頂點。從萊比錫的「週一示威」（Montagsdemonstrationen）起，各地陸續響應、發起和平抗爭。當蘇聯改革領袖戈巴契夫在國慶日到訪，柏林的示威者隨即喊出「戈比幫幫我們！」（Gorbi hilf uns!）、「不要暴力」（Keine Gewalt!）以及「言論自由」（Pressefreiheit!）等口號。此時，即便暴力鎮壓，也難以遏止越來越多的民眾加入。直到東德解體前夕，聚集於亞歷山大廣場上的抗議者已近百萬人。

² 東德人民在圍牆倒塌之前，並不享有自由出國離境的權力。獲准出國是一種特權，通常僅授予特定階層者，如黨政經要員或科學家、研究者、運動員及藝術家等對公共生活有影響力者，獲得的原因則缺乏固定準則，必須基於對黨及意識形態上的忠誠。參考自：Stefan Wolle (2019), Reisekader und Wissenschaftspolitik。出自：《Enquête-Kommission „Überwindung der Folgen der SED-Diktatur im Prozeß der deutschen Einheit“》Wahlperiode 13, Band IV/2, 頁：1614 und 1615。檢索網址：https://enquete-online.de/recherche/detail/?show=wp13b4_2_0671

【涉及議題】記憶的建構性質與威權遺緒的無所不在

如何隔絕母親於現實世界之外並「重現」已不存在的東德，是電影的主要劇情。從直觀的角度來看，這展示了前東德人民如何「想像」或「記憶」已經不存在的過去；而從後設的角度來看，這也間接反映了主角亞利、母親以及周圍親友的行為，如何體現了威權統治留下的影響。

東西德兩個不同體制合併後，至今仍未能完全地磨合。在多年的分隔及意識形態宣傳導致下，雙邊存在著不小的偏見與誤解，譬如東德人認為西德人自大而傲慢，西德人則視共產體制下的東德人為懶惰怠工的一群。前東德人民更不滿於統一後的處境，包括前東德地區不敵西德企業競爭引發的失業潮，經濟狀況的低下導致平均收入、基礎建設及就業機會的落差等。以上這些都持續地使人口外流，造成前東德地區的進一步衰退。

東德博物館（DDR Museum）館長斯蒂凡·沃勒（Stefan Wolle）指出，處理東德威權遺緒最困難的部分在於，對於東德的記憶常受到後來的失望情緒影響；在九零年代那段時間的經歷越差，那個人人都對彼此如此友好、實際上卻不存在的「好的老東德」就越美麗。³

本片中，母親友人「希望一切都和過去一樣」的願望和「來到這裡就好像回到過去」的感嘆，正是這種「懷舊濾鏡」的體現。這樣的「想像中」或「記憶中」的東德其實是個從未真實存在過的國家。記憶絕非對過去的準確再現，而是用各種「替代品」建構出來的。

³ Mitteldeutscher Rundfunk (2021.4.7), Glückliche Kindheit oder Diktatur? Streit um die "richtige" DDR-Erinnerung. Interview: Wird die DDR eigentlich schlechtgeredet? 檢索網址：
<https://www.mdr.de/geschichte/ddr/alltag/streit-um-erinnerungen-kindheit-in-der-ddr-100.html>

而母親昏迷後亞利的各種「措施」，雖是出於親情的謊言，卻在不知不覺中重現了「國家」的角色。他控制生活物資，如罐頭和服裝；他拔除收音機的天線，阻絕外界消息；他自製新聞，重新詮釋真實發生的事件，讓它看起來仍舊符合東德政權之下的原則；組織生日會時，也精心策劃了出席者和發言。虛假的現實是在亞利的全面管控下，才得以確保。

導演與編劇在此巧妙地表達，為維持政權的穩定與合法性，威權體制不僅使用強制性的暴力（如邊界管制與警察），即便是並未積極參與政治活動者，生活依舊被威權體制滲透。東德（或世界上其他威權政體）即便已然解體，仍留下實體與非物質的殘餘，包含象徵符號、物質文化、硬體建設、身體規訓、人際網絡及語文表達等。即便努力批判、擺脫它，卻總仍以各種形態一再地出現。即使亞利曾經反抗威權體制，並試圖改造它成為自己「理想中的東德」，仍不免在無意識之間，重複了透過操縱媒體、變造訊息以達自身目的的手段。

基於日常與政治不可分離的交織關係，轉型正義應不只在狹義的政治領域中發生，更應於所有的領域——文化、藝術、教育、體育、科學研究、工業生產乃至日常生活之中，反省威權遺緒。

【聚焦臺灣】以歷史記憶的複雜、多樣與再脈絡化對抗復辟的威權

反省與紀念東德獨裁不義歷史的工作所遇到的挫折，並不僅僅是由於東西德之間的差異所致。更主要的關鍵點在於，多數前東德人的日常生活經驗與少數人的受壓迫經歷在存在落差，造成了認知上的矛盾和張力。威權體制當局的資訊審查和言論控管，加深了人民政治生活的空缺，也導致了人際交流與信任的匱乏。以凱納一家的遭遇來說，受壓迫的經歷甚至會被隱瞞，更不用說公然討論了。認知與經驗的差異延續到今天，因而產生對威權政權的不同解讀；再加上對新社會體制的適應困難，亦可能使人轉向懷舊，這些都在阻礙對過往歷史的批判性討論。

同樣的狀況也出現在臺灣，2013 年，文化部轄下的中正紀念堂曾舉辦「臺灣設計蔣」的活動，希望以文創商品的發想來包裝行銷中正紀念堂，卻忽略蔣介石主政的威權時期戕害民主及人權的相關訊息，當時活動也因抗議叫停。

又譬如臺灣部分影視劇作品中，以共融、和諧與懷舊景象再現眷村，然而這顯然忽視白色恐怖時期，眷村與國家政策、軍隊運作的高度連結。譬如早期眷舍為因應「反攻大陸」口號，非軍官階層者僅能居住於臨時就地取材搭建的簡陋房舍中；五零年代中期起，由婦聯會倡議興建，品質較佳的居住空間，則是為了軍隊的穩定管理，以符合該會的宗旨「團結全國婦女以照顧軍眷，使其前線將士無後顧之憂而能專心抗敵」。除此之外，眷村也經常是受到監控、管制介入的對象，更遑論許多非正式眷村中，低階官民的困苦處境。

懷舊也不只在於威權統治時期，近年臺灣社會瀰漫著另一股對日殖時期的懷舊風潮，各地方政府則劃撥經費，修復或者重建日殖時期的神社舊跡，然而

卻未在展呈內容中提及「國家神道」與「軍國主義擴張」之間的深厚連結，僅以觀光象徵呈現。

一如「東德情結」，臺灣的飲食旅遊文化、文學寫作、表演藝術到影視作品產出，不乏美化威權、去政治或錯置脈絡的商品與訊息。這正是臺灣當前的困境之一：部份地強調威權時期好的個人經驗與記憶，神話化特定政治人物，過度誇耀某些成就，同時淡化其政治社會背景，忽略威權體制對其他個體所造成的壓迫與侵害。當部分人認為「轉型正義」已然足夠，呼籲某種和諧的社會圖景，並認為應停止究責與追求真相所帶來的「動盪」時，威權遺緒卻仍在政治體制以外，持續於物質、精神與文化價值等層面上，延續其效力。

至今，對二二八、白色恐怖乃至帝國殖民統治的歷史進行徹查、究責、賠償與紀念等工作時，仍然充滿著許多阻力。拒絕面對糾結複雜的威權過往，不僅將使未曾親身經歷者缺乏對不義歷史的批判性理解，甚至將引發威權的復辟，進而損害民主。

正如同凱納一家的經驗：當亞利用仿若威權政府的手段掩蓋真相，勉力維穩之時，並無助於化解對父親不告而別、母親傾力忠黨愛國的不諒解以及對轉變中的社會的種種不滿。唯有母親道明緣由，拉荷向母親揭露圍牆已塌，家人之間才逐漸結束表面和諧下的相互猜忌與怨懟，脫離時空倒錯的歷史裂縫，迎向現實生活。而至終仍搬演著獨角戲的亞利，他謊言中的「理想東德」也逐漸變成對於「威權東德」的批判：何以政府不能接收難民、開放邊界，予人民自由的生活。

而值得臺灣借鏡的正是：將過往的經驗與事件再脈絡化，肯定其認同與政治上的複雜程度，而非排拒衝突、忽視矛盾或以刻板、和諧的方式片面再現，才能防衛威權遺緒對民主的侵害。

【延伸閱讀】

- Philipp Ther，《歐洲 1989：現代歐洲的關鍵時刻，從冷戰衝突到政治轉型，解讀新自由主義之下的舊大陸與新秩序》，麥田出版，2019 年。
- 弗羅里安·賀克·馮·唐納斯馬克 (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)，《竊聽風暴》(Das Leben der Anderen)，2006 年。
- 林育立，《歐洲的心臟：德國如何改變自己》第三部分〈揭露真相，走出獨裁〉第一至五章，衛城出版，2017 年，頁183-247。
- 潘宗億，〈再見列寧：消費東德與新德國國族認同危機〉，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》，第 46 期，2016 年，頁 151-214。
- 斯維拉娜·亞歷塞維奇 (Святлана Аляксандраўна Алексіевіч)，《二手時代》(Время секонд хэнд)，2016 年。